



大学经典

吕思勉
撰

白话本国史(上)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白话本国史（上）

吕思勉 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白话本国史（上）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

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白话本国史

导 读

李永圻 张耕华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笔名骛牛、程芸、芸等。1884年2月27日（清光绪十年二月初一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十子街的吕氏祖居，1957年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六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起就跟随私塾教师读书，三年以后，因家道中落而无力延师教授，改由父母及姐姐指导教学。此后，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他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各种文史典籍。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吕先生夙抱大同思想，毕生关注国计民生，学习新文化，吸取新思想，与时俱进，至老弥笃。

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教育和研究工作。1905年起开始任教，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1907年）、常州府中学堂（1907年至1909年）、南通国文专修科（1910年至1911年）、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年至1914年）等学校任教。1914年至1919年，先后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其后，又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至1922年）、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至1925年）、上海沪江大学（1925年至1926年）、上海光华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其中，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最久，从1926年至1951年，一直在该校任教授兼历史系系主任，并一度担任该校代校长。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遂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吕先生是教学与研究相互推动的模范，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吕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学术史、史学史、历史研究法、史籍读法、文学史、文字学等方面写下大量的论著，计有通史两部：《白话本国史》（1923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下册1944年）；断代史四部：《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近代史一部：《吕著中国近代史》（1997年）；专著若干种：《经子解题》（1926年）、《理学纲要》（1931年）、《宋代文学》（1931年）、《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中国民族史》（1934年）、《中国制度史》（1985年）、《文字学四种》（1985年）、《吕著史学与史籍》（2002年）；史学论文、札记及讲稿的汇编三部：《吕思勉读史札记》（包括《燕石札记》、《燕石续札》，1982年）、《论学集林》（1987年）、《吕思勉遗文集》（1997年）；以及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十多种，著述总量超过一千万字。他的这些著作，声名广播，影响深远，时至今日，在港台、国外仍有多种翻印本和重印本。吕先生晚年体衰多病，计划中的六部断代史的最后两部《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做了史料的摘录，可惜未能完稿，是为史学界的一大遗憾。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所写的第一部通史著作。1920年10月，拟定写作序例，至1922年完成全书的编撰。1923年9月，《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并一再重印，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的一部中国通史。1931年，吕先生应商务印书馆的要求，对第三篇第一章“南宋和金朝的和战”的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作为国难后的修订本继续发行，1935年，修订本已发行到第四版。

《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后，吕先生曾很仔细地作过一遍订正，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20世纪50年代初，他在《“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中，自评《白话本国史》“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藉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予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

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

1990年，《白话本国史》收入《民国丛书》第二编，由上海书店影印出版。

本次《白话本国史》的新版，以1923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为底本，参照了作者生前的修改和吕翼仁先生的校订。原书直排繁体、双行夹注，现改为横排简体、单行夹注。原书的一些讹误也作了改正，其他如习惯用词、行文遣句、概念术语等，则基本未动。作者的眉批，新版以页下注的方式加以注明，以便读者参考。

《白话本国史》采用的是民国纪元的方法来纪年，以1912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民国纪元之后是顺向增加，称民国二年、民国三年等，其与公元纪年的换算方法如下：

一、民国之后的换算方式为： $1912 - 1 + \text{民国年数} = \text{公元纪年}$ 。

如：民国五年： $1912 - 1 + 5 = \text{公元} 1916 \text{ 年}$ ，民国十年： $1912 - 1 + 10 = \text{公元} 1921 \text{ 年}$ 。

二、民国之前的换算，因涉及公元前后，故有二种方式：

1. 当逆推年数小于1912时，换算方式为： $1912 - \text{民国前年数} = \text{公元纪年}$ 。如：前1905年： $1912 - 1905 = \text{公元} 7 \text{ 年}$ ，前745年： $1912 - 745 = \text{公元} 1167 \text{ 年}$ 。

2. 当逆推年数大于1912时，其年代已处公元前，换算方式为：逆推年数 $- 1912 + 1 = \text{公元前年代}$ 。如：前2120年： $2120 - 1912 + 1 = \text{公元前} 209 \text{ 年}$ ，前2078年： $2078 - 1912 + 1 = \text{公元前} 167 \text{ 年}$ 。

序 例

我很想做一部《新史钞》，把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事情，钞出来给大家看看。其原因如下：

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1）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臆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因有这种原因，所以我想做部书，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又用极谨严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但是这种书已经不大容易做了。就做成了，也不大容易刻。

这一部书，是我历年在学校里教授所豫备的一点稿子，联缀起来的。虽然和《新史钞》的体例相去尚远。然而其中也不无可取之处。给现在的学生看了，或者可以做研究国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我这一部书，和以前出版的书，重要的异点如下：

（一）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此外特别的考据，特别的议论，也还有数十百

条。即如中国的各种民族（特如南族近人所通称为高地族的），似乎自此以前，也没有像我这么分析得清楚的。

（一）读书自然不重在呆记事实，而重在得一种方法。我这部书，除掉出于愚见的考据议论外，所引他人的考据议论，也都足以开示门径；可称是研究史学的人必要的一种常识。

（一）这一部书，卷帙虽然不多；然关于参考的书，我都切实指出（且多指明篇名卷第）；若能一一翻检，则这部书虽不过三十多万言，^①而读者已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且不啻替要想读书的人，亲切指示门径。

（一）现在读史，自然和从前眼光不同；总得在社会进化方面着想。但是随意摘取几条事实（甚且是在不可据的书上摘的），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硬说是社会进化的现象。却实在不敢赞成。我这部书，似乎也没这种毛病。

以上的话，並不是要自行表扬；只是希望读者诸君，在这方面注意一点。至于这部书的体制，我还有几条要说，如下：

（一）本书全用白话，取其与现在人的思想较为接近。但遇（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要减少其精神，（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

（一）全书区区三十餘万言，^②于历史上的重要事实，自然不能完具。但其详略之间，颇有斟酌。大抵众所共知之事从略，不甚经见之事较详，有关特别考证之处最详。

（一）中国的历史，和东南洋中西亚各国，各民族，关系极多。要彻底明白中国史，必须于这诸国诸族的历史，也大略叙述。但为篇幅所限，只得想个断制之法。其民族遂入于中国，变为中国之一民族者详之。其余便只能述其与中国关系的事情。我于这一部分，也略有研究。将来若有机会，当再另做一部书，以飨读者。

（一）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第。惟当然可知其在何篇何卷的，不再加注，以避繁琐。如某君时代某人之事，当然在正史某帝纪某

① 原文如此。——编者注

② 原文如此。——编者注

人传中，某朝的赋税兵刑制度，当然在某史的食货刑法志内之类。

（一）纪年都据民国纪元逆推。但若必须知其为某朝某君时之事，或须知其为西元何时之事，则或附注于下，或竟从变例。

（一）地名除与现今相同者外，均注明其为今何地。惟区域太大者，其势无从注起（如郡只能注其治今何地，势难尽注其所辖之地），请自用读史地图等参考。人地名有参照西史的，都于其下附注原文。

（一）双行夹注，为吾国书中最善之款式（可使首尾完全，而眉目仍清醒），故本书仍多用之。^①本书用双行夹注处，与用夹句号处不同，并注意。

（一）凡引用成文处，除提行另写外，两头皆施“”号。删节处用……号。其（1）名词，（2）成语，（3）特别提出的名词或语句，（4）引用他人之言而不尽照原文钞录处，均用‘’号。^②

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著者自识

① 本次排印，双行夹注改作单行夹注。——编者注

② 本次排印，原书所用‘’号改作“”号。——编者注

